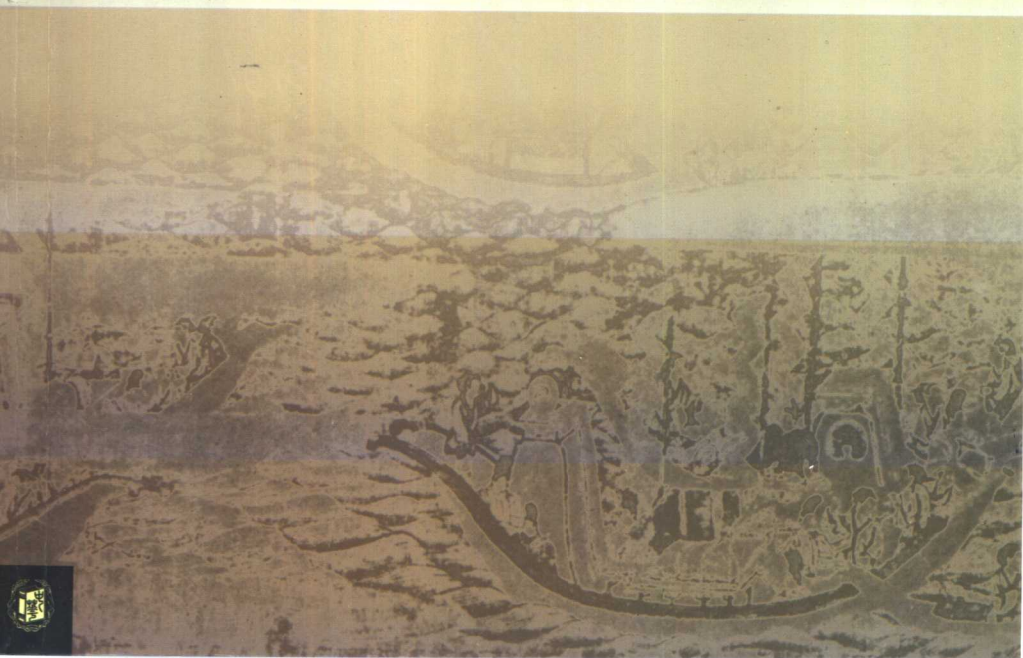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

中日关系史论考



中日关系史论考

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日关系史论考/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
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01.7

ISBN 7-101-02904-3

I. 中… II. 浙… III. 一中日关系—国际关系史—研究—文集 IV. D829.313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2641

责任编辑 李解民

中日关系史论考

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

中华书局出版发行

(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10 印张·227 千字

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 册 定价:16.00 元

ISBN 7-101-02904-3/K·1229

前 言

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成立于 1989 年,下设“古代日本文化交流史”、“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”、“日本哲学思想史”3 个研究室,研究重点是日本文化及中日关系史,同时培养相关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。

本所创建之初,确立了“立足本地,放眼世界;开门办所,促进交流”的基本方针,通过共同申请课题、举办国际会议、出国讲学进修、邀请专家讲演等方法,不仅与国内同行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,成为国内日本文化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;而且开拓了与日本、韩国、欧美学界的交流渠道,为中国的日本研究与国际接轨作出了微薄的贡献。

本所创建以来,共主持省部级和国际科研项目约 25 项,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有:中日汉籍交流史研究(日本国际交流基金)、遣唐使时代的中日混血儿基础研究(日本住友财团)、遣唐使时代在中日文学中的投像(日本文部省)、中国图书馆藏日本版古籍的调查与研究(日本国际交流基金)、晚清中国人视野中的日本(中国国家教委)、明治前期驻日中国外交官与日本(日本住友财团)、东亚的书籍之路(日本国际交流基金)等。

本着“立足本地,放眼世界;开门办所,促进交流”的方针,我们

利用课题经费举办了各类国际学术会议。主要会议有：中国和俳句国际研讨会(1990)、汉籍与中日文化国际研讨会(1991)、江南与日本国际研讨会(1995)、遣唐使时代的东亚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(1998)、清代中日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(1999)、中日书籍之路研讨会(2000)等。此外，从1991年开始，我所与神奈川大学的双边学术研讨会已连续举办了9届，与静岡大学的双边学术研讨会也已举办了4届。

上述课题研究和国际会议的成果，大多以专著或论文集的形式在国内外出版，迄今我所已出版中文著作42部，日文著作15部。代表性的中文著作有：《日本文化研究丛书》(已出8卷，其中，《中日汉籍交流史论》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成果二等奖，《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》获浙江省教委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二等奖)、《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》(共10卷，获亚太出版协会 APPA 学术类图书金奖)、《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》(已出3卷)等；代表性的日文著作有：《圣德太子时空超越》(大修馆)、《天台的流传》(山川出版)、《吾妻镜补——中国第一部日本通史》(朋友书店)、《唐视野中的遣唐使》(讲谈社)、《中国历史中的日本形象》(农文协)等。此外，本所与神奈川大学合作编辑的《中日文化论丛》，已逐年出版至8期。

1999年值本所成立10周年之际，我们组织编写了这部论文集。希望以此作为我所10年历程的一个缩影，一是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，确定新的奋斗目标；二是对长期以来关心我们的国内外有关机构和个人表示衷心感谢，并期待今后继续给予支持。

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 王 勇

2001年4月1日

目 录

前言	王 勇(1)
----------	----------

哲学·思想

禅学东渐及对日本文化的影响	王守华(1)
中日哲学间的对话	卞崇道(17)
论石门心学与孟子心学的关联	李魁平(41)

文化·艺术

雪之纯净 舟之恒动

——雪舟与中国文化	刘晓路(61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雅乐和佛教

——对其思想关联性之考察	〔日本〕南谷美保(85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

佛教传播日本源流考..... 韩 昇(106)

历史·典籍

《三经义疏》在东亚的流播

——兼论隋唐时代的中日书籍之路..... 王 勇(135)

市河宽斋与《全唐诗逸》..... 蔡 毅(156)

从清代档案看中日关系 [日本] 松浦章(177)

试论清朝对日本海难难民的救助与遣返

制度之形成 刘序枫(194)

近代中日文人的文字缘 张伟雄(223)

清末驻日外交使节名录 王宝平(239)

浙江留日学生监督孙淦事迹考 吕顺长(256)

近代中日“琉球问题”交涉 米庆余(271)

禅学东渐及对日本文化的影响

王守华

禅宗也称佛心宗、达摩宗,其渊源最早可追溯到佛陀在世之时。传说有一天,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拈花,瞬目扬眉示众,众徒不解其意。唯独摩诃迦叶解颐微笑,解“涅槃妙心,实相无相,微妙正法”,而得佛心法。从此以心传心,衣钵相承,传至第28代菩提达摩(?—528)。菩提达摩于520年(一说527年)到中国,同年入嵩山少林寺,面壁9年,提出“理入”和“行入”的修行方法,^①开创中国的禅宗。印度的禅学只是作为“三学”、“六度”组成部分的习修。^②而作为“六度万摄于一禅,不立文字,教外别传,直指人心,见性成佛”的禅宗,则是中国的佛教宗派,实际创始人是六祖慧能(638—713)。六祖之后有青原行思(?—740)、南岳怀让(677—744)两家。青原系形成曹洞、云门、法眼三宗;南岳系形成沩仰、临济两宗,共称“五家”。其中临济、曹洞流传时间最长,影响最大。临济又分为黄龙、杨岐两个支派,与上述五家并称“五家七宗”。传到日本的是曹洞、临济两派。

(一)禅学东渐及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

禅宗传入日本,最早可追溯到奈良时代(710—794)。653年日

僧道昭(628—698)入唐,从玄奘、窥基学唯识教义,同时在相州隆化寺从慧满学禅,回国后在奈良元兴寺开设禅院。此为禅学传入日本的端倪。736年中国的道璇和尚(703—760)受日方劝请,到日本传授戒律,同时将禅宗(北宗)介绍到日本。日僧行表(723—797)在承受道璇戒律的同时,也继承了北宗禅。日本天台宗的开创者最澄(767—822)入唐(804)求法时,遍学圆、密、律、禅,曾从天台山禅林寺脩然受牛头禅传授。回国后在主张“圆密一致”的同时,也主张“四宗合一”。天台宗名僧圆仁(793—864)入唐求法时,曾向青州居士萧度中问禅法。^③回国后,在比叡山祭赤山大神为禅宗的守护神。但是这些还不是日本的禅宗,只是依附于法相、律、天台宗的禅学。

弘仁年间(810—823),应嵯峨天皇的皇后(檀林皇后)之劝请,中国禅僧义空率法弟道昉到日本,^④开檀林寺,大力倡导禅宗。虽当时皈依者鲜见,但此事被作为“日本倡导禅宗的开始”。^⑤1171年日天台僧人觉阿与法弟全庆入宋,从佛海慧远禅师学禅,得杨岐派禅法而归,“这是日本有临济禅的开始”。^⑥1189年摄津三宝寺的能忍派弟子二人入宋,从育王山佛照禅师,并遥受所赠信衣,以后道誉日高,自称“日本达摩宗”,在京都广为传布,禅宗逐渐为人所知。但是,真正开创日本禅宗的是荣西禅师。

日本禅宗创始人荣西(1141—1215),俗姓贺阳氏,号明庵、叶上房,通称千光国师,备州(今冈山县)吉备津人。自幼出家,在比叡山学天台教义,受大乘戒,并兼学真言宗,受密宗灌顶。他闻得中国禅宗盛行,决意到中国求法。1168年4月随商船从博多到达明州(今宁波),朝拜了天台山和育王山,同年9月携天台宗章疏30余部回国。1187年再度入宋,目的是想去印度朝拜释迦灵迹。因“关塞不通”,而再度登天台山,从临济宗黄龙派第8代嫡孙虚庵

怀敞学禅,后又随虚庵移居天童山,侍奉于禅师左右,终得授正传大戒,承临济宗正宗法脉。虚庵赠僧伽梨衣为附法信衣,宋孝宗赐“千光法师”封号。1191年回国,先在博多建圣福寺,后在镰仓寿福寺、京都建仁寺大力弘扬临济禅,成为日本禅宗初祖。荣西著有《兴禅护国论》,宣传“单传心印,不立文字,教外别传,直指人心,见性成佛”,与“专为护国家利众生”的“护国主义”的一致性。^⑦荣西之后有退耕行勇(1151—1241)和释圆荣朝(?—1247)分别在京畿和关东地区弘扬禅法。行勇的弟子大歇了心曾入宋留学,日本禅宗的衣服、典礼的规范化是从他开始的。行勇的另一弟子圆尔辨圆(1202—1280)于1235入宋,侍奉径山无准禅师6年,受其传法心印。归国后建东福寺弘扬禅法。宋末元初,一些不服元朝统治的中国禅僧到日本避乱。兰溪道隆、兀庵普宁、无学祖元、镜堂觉圆、灵山道隐、正澄清拙、大休正念、一山一宁先后到达日本。他们大都属无准法系,到日本后得到将军(北条氏)的青睐和天皇的敬慕,对在日本弘扬临济禅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。

曹洞宗之传日,最早可追溯到唐末该宗创立时期。9世纪末,日僧能光(?—933)入唐,从洞山良价学禅,并得其心印。后游化四川,开碧鸡坊,受到道俗归敬。但能光死于中国,未能将曹洞宗默照禅传回日本,只能算作曹洞宗与日本的早期因缘。真正将曹洞宗传到日本的是道元(1200—1253),俗姓源氏,初名希玄,号佛法房,是村上天皇第9代后裔、内大臣久我通亲之子。13岁出家,初信天台宗,在游学建仁寺时谒见了荣西,遂归依禅宗。1223年与法兄明全结伴入宋,游历育王山、径山等名刹,遍访各地名师。后在天童山跟洞山良价第14代正传长翁如净学禅,追随左右4年,终得继承其法脉,并得曹洞宗第8代祖芙蓉道楷所传之法衣、顶相、^⑧嗣书等。1227年回国,初居建仁寺、深草。1233年,山城极

乐寺修复,并改为禅院,四条天皇赐“兴圣宝林禅寺”额号,道元在此广集四方僧徒,开堂讲法。此事被认为是日本曹洞宗之开端,道元被尊为始祖。道元著有《正法眼藏》、《永平广录》、《永平清规》、《普劝坐禅仪》、《学道用心集》等。道元圆寂后,东明慧日(1270—1340,定海人)于1308年到日本,历住禅兴、圆觉、建长、万寿、寿福等寺,大力弘布默照禅风,为日本曹洞宗之二传。东陵永(?—1365,四明人)于1351年到日本,为曹洞宗之三传。三人对曹洞宗的传播均作出很大贡献。只是东明、东陵的法脉断绝已久,唯有道元之法系一脉相传至今。

日本禅宗由于传入者和所承法统的不同,历史上形成了24个支派,称为“禅宗24流”。由于日本禅宗的“护国主义”与“见性成佛”的特点,深得皇室、贵族的青睐和幕府的支持,特别受武士的欢迎。镰仓幕府的统治者北条氏一家都皈依禅宗,南北朝的楠木正成也寄志于禅,室町幕府的统治者足利氏也深深皈依禅宗。日本历来有“武士好禅”的说法。临济宗深得朝廷、幕府的推崇和皈依,其影响主要在上层,信徒多将军、武士。曹洞宗主要在地方上传播,其影响遍及下层,信徒多农民,故有“临济将军、曹洞土民”的说法。

室町时代,日本禅宗达鼎盛时期,模仿中国(南宋)的官寺之例,制定“京都五山十刹”和“镰仓五山十刹”制度,合称“东(镰仓)西(京都)五山十刹”。五山禅僧不但活跃于宗教领域,而且唱和于诗文舞台,几乎垄断了当时日本的文化。室町末期,由于战乱,佛教寺院亦难免罹其祸。加上织田信长采取支持“切支丹宗”(天主教)抑制佛教的政策,使得禅宗和其他宗教一样,受到一定的挫折。

江户时代是日本封建制度的全盛期,随着封建秩序的巩固,佛教的各项制度也日趋完备,形成了严格的寺檀关系。临济宗的崇

传长老(1569—1633)追随于德川家康左右,深得幕府信任,受令主管各寺院。幕府对诸宗寺院的各项法度皆出其手。由于朱子学被定为官学,加上儒学家及神道学家的排佛,佛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相对缩小,禅宗的宗风也相对地衰微。在此情况下,临济宗白隐禅师(1685—1768)出来重整宗风,被称为“临济宗的中兴祖”。曹洞宗也由于心越兴传(1640—1696)由中国抵日,和天桂禅师的大力说法化教,使宗风逐渐恢复和兴隆。又经月舟(1619—1696)和圀山(1635—1714)的复古革新,使曹洞宗宗风再度振兴。但是禅寺的清规和风气已很荒废,正值此时,隐元禅师抵日,创立了日本黄檗宗,才改变了禅宗进一步衰微的局面。隐元(1592—1673)名隆琦,俗姓林,福州福清人。1612年在普陀山皈依佛门,1620年在黄檗山正式剃度出家,拜鉴源禅师为师。不久周游各地,遍访名师,曾跟密云、费隐参究禅法,1634年受传印信,1637年继承黄檗山首座,门下就学者如市,成为一代名禅僧。清初,连续4次受长崎福济、崇福、兴福等寺的劝请,携弟子大眉、独湛、南源、独吼等,于1654年抵达日本,日僧纷纷前来参谒受教。不到一年,“他的道声已传遍东西,似乎有把日本禅海翻倒过来之势。”^⑨1658年东上江户谒见将军,次年受赐于山城(今京都)宇治郡建寺,号“黄檗山万福寺”。其规模、制度完全按照福州府福清县黄檗山万福寺旧例,是为日本黄檗宗始祖。中国黄檗山创始于唐代(789),原名建福寺,至元代衰微,明神宗时再建,更名万福寺,是临济宗的道场。传到日本的黄檗宗,脱离临济宗,制定《黄檗清规》作为宗规,成为独立的宗派,其禅风盛于关东一带。从此日本禅宗形成了临济、曹洞、黄檗三足鼎立的格局。隐元之后,黄檗山的13代住持,都是中国去日的禅僧。直至第14代龙统开始,黄檗山才由日僧主持。

明治维新前后,出于确立资本主义体制的需要,佛教和儒学被

作为封建意识形态加以批判,一度形成了“废佛毁释”运动。加上启蒙运动的展开,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发展,对于佛教无疑是个打击。为了自己的生存,佛教发起了“护法运动”。明治宪法颁布(1889)以后,确定了“信仰自由”政策,佛教重新被统治者加以扶植和利用。为了跟上文明开化的潮流,佛教学者利用西方哲学来诠释佛教理论,以使佛教在日本更生。禅宗和其它宗派一样,竞相兴办文化教育事业(曹洞宗最多,有30个中学林,1个大学林),派人出国留学、考察,出版佛学著作。佛教又重新取得了发展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3个佛教宗派中,禅宗占3个,它们是:临济宗,下分相国寺、建仁寺、南禅寺、妙心寺、天龙寺、建长寺、东福寺、大德寺、圆觉寺、永源寺、方广寺、国泰寺、佛通寺、向狱寺等14派,各设管长管理;曹洞宗,以永平寺、总持寺为本山,由两本山的贯首每年轮流任管长;黄檗宗,以京都宇治的万福寺为本山。目前日本禅宗约有近19000座寺院,3万多僧侣,852万信徒。其中主要派别曹洞宗拥有寺院14682座,僧侣27512人,信徒688万人;临济宗妙心寺派拥有寺院3436座,僧侣3734人,信徒101万人;临济宗建长寺派拥有寺院405座,僧侣451人,信徒23万人;黄檗宗拥有寺院500余座,信徒35万人。^⑨禅宗还拥有驹泽大学等一批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,出了铃木大拙(1870—1966)那样具有世界影响的禅学家。

日本禅宗在理论上承袭了中国禅宗的“本性是佛”、“无念为宗”、“顿悟成佛”的基本教义,同时也具有宋代禅宗灯录、语录的特点。在方法上继承了临济宗“禅话”和曹洞宗“默照”的修行方法,甚至形式上也模仿中国的“五山”、“十刹”。日本禅宗也有自己的特点:一是与政治联系紧密。兴禅的目的在于净化心灵,剔除杂念,达到无我而护神国的目的,即所谓“兴禅护国论”。二是入世禅

学。历史上,日本佛教各派各有自己的社会基础及影响范围,天台、真言依靠公家(朝廷),禅宗依靠武家(幕府),净土流行于武士和平民,真宗和日莲宗的信徒主要是下层群众。除净土、真宗和日莲外,几乎都肯定现实。禅宗得到幕府将军的支持,禅僧禅儒兼修,以兴隆文教为己任,且有不少人还俗归儒,讲论治国平天下,甚至直接参与立法、决策及幕政,起到了入世禅学的作用。

(二)禅对日本文化的影响

禅宗传入日本以后,不但成为日本佛教史上的主要派别,而且又以其特殊的魅力,进入日本人的生活,对儒学、美术、书道、茶道、俳句、印刷术等日本文化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。

禅与日本朱子学

儒学早在3世纪就与汉字同时传入日本,以后逐渐得到传播,并被作为一种政治理念,在大化革新、颁布“十七条宪法”、制订律令等政治活动中起作用,也在“大学寮”及地方“国学”的教育活动中,在《古事记》、《日本书纪》、《怀风藻》等古典文献及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直到12世纪,传入的儒学均为汉唐时期注释的儒学经典。而集儒学大成的宋明理学,则是由禅僧传入并经禅僧传播发展的。将朱子学传入日本的是临济宗禅僧圆尔辨圆。圆尔为东福寺开山祖,禅儒兼修,在宋朝的6年(1235—1241)中,先后受教于无准、北磻、痴绝禅师。北磻和痴绝是南宋禅门中有名的“儒学家”,力主禅儒结合。辨圆深受其师影响,归国时携回内外典籍数千卷,其中有《晦庵大学或问》、《晦庵中庸或问》、《论语精义》、《孟子精义》、《晦庵集注孟子》、《五先生语录》等,并将这些

书籍藏于普门院,亲手辑成《三教典籍目录》。该目录虽已失传,但其法孙大道一以调查普门院藏书后编成的《普门院经论章疏、语录、儒书等目录》,如今尚存。目录所载许多书籍,今尚存于东福寺及宫内厅图书寮,均有普门院藏书印及“圆尔”署名手迹,是极为珍贵的宋刻原本。辨圆回国后,在弘扬禅学的同时,还曾讲授《大明录》,介绍二程、朱熹思想,宣传禅儒合一。

宋元之际,不断有中国禅僧到日本。他们在传播禅学的同时,也介绍了二程、朱熹、张载、扬雄的思想,对朱子学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。他们中有曾就学于无准、痴绝、北碕的临济宗禅僧兰溪道隆(1213—1278,1246年到日),他在建长寺传播禅学的同时,潜心理学,据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说正身诚意,以“儒僧”面目传播朱子学。兀庵普宁(1197—1276,1265年到日)在弘布禅法时,多用儒学语言。承石溪心月法脉的大休正念(1215—1289,1269年到日)在讲禅学时,多用儒学基本概念,注意存养省察功夫,强调儒、佛、道三教一致。承佛鉴衣钵的无学祖元(1226—1286,1279年到日)儒学修养极高。在他的书中多儒学语言,如:“坐禅之时,一切放下,此身此心,要与太虚平等圆满,而不见太虚之量。”“在方同方,在圆同圆,与太虚同一相貌,谓之圆觉道场。”^⑩以心比太虚,实是以儒释禅,在宣传宋儒太虚之说。一山一宁(1247—1317,1299年到日)在日讲法20年,影响极大,学术界素有“宋学研究,可以说从一山开始。自此以后禅僧无不兼儒,蔚成禅学与儒学之一大合流,禅儒合一,参禅者无不倾心宋学”的评价。^⑪至14世纪,出现了虎关师练、雪村友梅、梦窗疏石、中岩圆月、义堂周信、中津绝海、歧阳方秀等禅儒兼修的日本禅僧,他们以镰仓和京都的五大禅寺为中心,研习中国文学和程朱理学,论仁义之道、性命生死之理,说儒释道三教合一,为朱子学的和化作了大量工作,对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作出了

贡献。在他们的影响下,公卿与将军也热衷于参究禅学,同时兼听儒学讲座。16世纪,出现了博士公卿、萨南、海南三个专门研究儒学的学派,这些学派的代表人物桂庵玄树、一条兼良、清原业忠、二洲一翁、月渚英乘、文之玄昌、忍性、如渊、信西皆为禅僧。他们讲儒书,传儒学,并在局部范围内将它扩展到政治、思想和经济生活方面,为后代儒学的隆盛打下了基础。江户时代,禅僧藤原惺窝(1561—1619)弃佛归儒,开创日本朱子学派,使儒学最终摆脱了禅学之束缚,向伦理方向发展,成为统治日本265年的德川幕府的“官学”。朱子学的核心范畴“理”是吸收了佛教,特别是禅宗思想的产物。日本朱子学“无想无念之时,有理而存”,^③即认为天地万物间有先验之理的思想,本自华严宗理法界(理即真如、佛性),也是禅宗的根本思想。日本朱子学认为一草一木都具固有之理的思想,^④与禅宗的“青青翠竹,尽是法身”是一脉相通的。室鸠巢、林罗山等人的理气合一论,与禅宗的“一性圆通一切性,一法遍念一切法。一月普观一切水,一切水月一月摄”不谋而合。^⑤

禅与日本阳明学

江户时代,作为民间学派而崛起与“官学”朱子学相抗衡的日本阳明学派,其渊源最早可追溯到室町后期。1511年,禅僧了庵桂悟(1424—1514)奉命以87岁高龄出使中国。完成使命后,明武宗慕其高龄,赐金襴袈裟,令住育王山广利寺。当地士大夫、文人墨客均与之相交。1512年与王阳明相遇。1513年5月闻桂悟将东归,王阳明作《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》一幅相赠,全文如下:

世之恶奔竞而厌烦挈者,多遁而之释焉。为释有道,不曰清乎!挠而不浊,不曰洁乎!狎而不染,故必息虑以

浣尘,独行以离偶,斯为不诡于其道也。苟不如是,则虽皓其首,缁其衣,梵其书,亦逃租徭而已耳,乐纵诞而已耳,其于道何如耶?今有日本正使堆云桂悟字了庵者,年逾上寿,不倦为学,领彼国王之命,来贡珍于大明。舟抵鄞江之浒,寓馆于驺,予尝遇焉,见其法容洁修,律行坚巩,坐一室,左右经书,铅采自陶,皆楚楚可观爱,非清然乎!与之辨空,则出所谓预修诸殿院之文,论教异同,以并吾圣人,遂性闲情安,不哗以肆,非净然乎!且来得名山水而游,贤士大夫而从。靡曼之色,不接于目;淫哇之声,不入于耳;而奇邪之行,不作于身。故其心日益清,志日益净,偶不期离而自异,尘不待浣而已绝矣。兹有归思,吾国与之文字交者,若太宰公及诸缙绅辈,皆文儒之择也,咸惜其去,各为诗章,以艳饰迺躅,固非贤而滥者,吾安得不序。皇明正德八年癸酉五月既望余姚王守仁。^⑩

阳明作此序时年42岁,已倡导致良知说。他们曾在一起“辨空”,“论教异同”,对于桂悟不能无所启发。此事颇为日本学术界重视,称桂悟“为日本王学提倡之嚆矢”,^⑪“日本阳明学之传,从了庵桂悟开始”。^⑫至江户时代,中江藤树正式开创日本阳明学派,其主观唯心主义思想,与禅宗的“心外别无佛,佛外别无心”,“三界唯心,森罗万象,一法之所印”是息息相通的。禅僧为阳明学之传日立了首功,乃是不可忽视之事实。

禅与武士道

武士道是日本武士的道德规范和生活礼仪,也是日本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种特有精神。禅宗传到日本以后,由于